

与张学良的几次交涉

林久治郎*

忍气吞声的东北当局

自从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死以后，中国方面的态度是极端消极的。非常恐惧与日本方面发生冲突，一改其昭和2年（1927年）下半年以来的排日姿态。今则相反，中国官民每见日本人就远避走开。后来查明的情况是，张作霖被炸身死后，张学良曾于5日回奉天，召集张的旧部高官商讨善后之策。其时，多数人都说这是日本人阴谋暗害的。有的主张提出抗议，有的主张与南方合作等等，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会中有前吉林省长王树翰，最初沉默不语，当他听到众人持论纷杂，不得一决时，才开口说道：“诸位：关于此次事件之是否出于日本人的阴谋一节，我们究竟有无确证？如无确证，即勿庸多论。即使有证据，我们对日本又能奈何？能战固好，如不能战，空喊证据又有何益？况且当前的要务，并不在日本人的策划如何，关键不是对外，而是我们内部的稳固团结。”这番话使大家都默然了。据说后来采纳了王的意见，不再追究事件的真相，等待张学良将驻滦州的三、四方面军^①大体整顿完毕后返回奉天，再议后事。

* 作者1928年至1931年任奉天总领事，本文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一书，文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① 指奉系军阀军队，自称为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由张学良指挥。

奉命阻止东北易帜

7月16日下午我往访张学良时，他对我说：“自从上月以来我们多次会见已经成为好友了。关于新政府今后的方针政策问题，很想听听朋友的意见。”接着又说：“南京政府不断劝告东三省政府实行统一合作，政府内部的意向也大体倾向于此，但我还想听听贵总领事的高见。”我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同各国的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您在上月末曾说，在满洲请求中日两国关系的协调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可是，如果同南方合作，上述希望就会完全成为画饼了。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我个人也要奉劝您加以阻止。此事对于我国政府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还要向田中首相请示。况且，此事不仅对日中两国关系影响巨大，同时还将破坏东三省三千万民众赖以发达的保境安民政策的基础，三省的父老也将为此感到遗憾。”会谈大约进行了3个小时。

归来我马上去访村冈司令官，向他表明：事态发展既已如此，仅以口头劝阻恐已无济于事。如果政府能下决心以武力加以阻止固然很好；倘若不然，就不如不予过问为佳。可否按此意思以电报向政府报告请示？司令官同意了我的意见，遂即给政府打了电报。18日晨得到回答的训令，其主旨为：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至于对方不予听取究竟应采取何种措施问题，则无任何指示。得此回训大为高兴的是军部，我则担心执行这一训令的后果，心中颇为不安。然而大势已难扭转，遂

于当天下午再度往访张学良，转达了本国政府的意向，并恳切劝他不能悬挂青天白日旗，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虽然我竭力劝阻，张学良终未应诺，只是回答说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第二天即20日下午，村冈司令官特在城内满铁公所初次会见了张学良。司令官对张作霖的逝世深表哀悼之忱，并诚恳地表示今后将给予充分的援助。当司令官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指杨宇霆——原注）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时，据说张学良感激得声泪俱下。这是司令官及其列席的武官所透露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各报记者都在日本内地的报纸上发表了。我对此虽然当时有些怀疑，其后经过一年左右，当时担任翻译的王家桢则私下对我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当天在满铁公所的会见结束后，王家桢陪张学良同车回去，在车上张问王说：“你能理解我今天为什么落了泪吗？”王答说不知。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奔流了。”听到这番话，我不能不为我同胞之头脑简单而惊惧。这一天的会谈是我前天那次交涉的继续，司令官对张学良当然也提出同样劝告，要他停止南北妥协。

吉林反筑路运动

吉林省城在东三省历来就是学生运动最盛的地方，但是民间有识之士中间也有不少人是亲日的。自8月中旬在延缓南北妥协问题上刘哲出现以来，又有杨策、林鹤皋（省议会议长）等吉林省头面人物前来奉天，同我方接触者已有不少。8月下旬的某一天晚上，满铁在汤冈子温泉招待了刘哲等二十多位中国官民，就是为了缓和吉林方面的气氛，使形势不向对我方不利方

面发展的措施之一。在座者中有位张学良的秘书、东北大学校长刘凤竹，系美国留学生，其夫人是东京女高师毕业。他也以吉林人民的身份表面上与日本人开始交往周旋，但其政治地位与其学历相较是尚未受到重用的，特别是同日本留学生王家桢等人的声势相对比，他当时正处在待机面动的时期。到这时，我已觉察到对铁道谈判的前景抱乐观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但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加以处理。为此，虽然有政府立即开始土地问题交涉的训令到来，但我则一方面禀复政府，说明土地交涉应俟铁道问题告一段落后再行着手，刻下尚非其时等等实情；另一方面我再次往访张学良以探明真相。善于见机行事、明敏机智的张学良则回答说：“不幸的是，现在这一谈判已在各地传开，许多社会公团以及学生们提了抗议；特别是当事地区的吉林省已经发生了学生反对运动。为了尽量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应该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以后再作处理，目前只好暂且等待一下。”对此，我就直截了当地向他指明：据说吉林方面的学生运动是由贵总司令左右的人唆使而引起的，务请加以注意。张学良默然不语，仅报以淡淡的苦笑，表示无可奈何。

与此同时，我又指使斋藤、江藤两人竭力向张学良施加压力。斋藤素与张学良关系不深，加以性格温厚，同张学良会见的机会也不多；而江藤氏则常常与张学良私下会晤，对他依然信任，仍认为在近期内问题能获得解决。我向他说明了张学良的诚意如何值得全面怀疑以后，他就去向张学良进行诘问，苦劝他要力促其成，但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与张学良激烈辩论

1928年岁暮，易帜运动渐臻成熟，终于29日傍晚付诸实施。入夜，城关内外商号都根据警察的命令将预先准备好的青

天白日旗一齐悬挂出来了。

东三省当局坚决要实行易帜，这在两三天以前就已经看得清楚了。如前所述，这次我并没有插手，只是在旁窥察动静。30日，一天杳无消息。31日，交涉员送来了关于悬挂青天白日旗给各国领事的同文照会。此次易帜的实行，是在延展期限已满之后，这是中国的自由，但我从个人与张学良之间的长期友谊考虑，总觉得他在这个时候，似乎应该对我有某种礼节性的表示，但他却没有向我打任何招呼。于是，我于31日下午4时去访问了张学良。

开头我说：“交涉员送来了照会。在限期以后实行易帜，本是预先可以想到的事情。但鉴于贵我双方的友谊，似乎事先总该打个招呼，本人一直在盼待着，但竟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令人失望。”张学良回答说：“我已指示交涉员前去往访，向贵总领事致意，他竟未去执行，深属遗憾。”我接着向他提出质问：“南京政府标榜革命外交，目的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帝国政府对于东三省易帜虽然未加反对，但对革命外交波及此地，却不能置诸不顾。我国在东三省权益之如何重大，本是贵总司令所充分了解的。因此，即使实现了妥协，也决不能容许对我国权益发生丝毫的危害。此次贵总司令断然实行易帜，不知在尊重我国权益方面是否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此，张学良回答说：“虽已实现南北妥协，但实质上东三省政府的态度依然毫无改变；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仅是名义上的，实际内容与以往并无不同，不会有危害友好国家利益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对于日本在条约上的权益，更要注意予以尊重，贵总领事尽可放心。”于是我又追问：“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交通部业已核准的吉会、长大（贵）两路工程承包合同，阁下是否有意立即执行？”张学良则回答说：“关于这一问题，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存在各种

复杂的相关情况，处理起来殊感困难。”我遂即严词向他诘问：“复杂的事态既能制造出来，处理起来又有何难。如在尊重权益的空言掩饰下，连业经交通部核准的铁路合同都不肯予以实施，其原因端在贵总司令缺乏诚意而已。南北妥协固非我国所欲过问，但若采用‘革命外交’而致危害我国权益，我国政府则断然不能容忍。不知贵总司令是否真已有此决心？”由于我这些话措辞激烈，张学良为之色变，以至粗暴地回答说：“事与南京政府有关，诸如铁道等问题，希即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最后我厉声向其声明：“贵总司令既然企图用易帜来蹂躏我国权益，即请慎加考虑，下定承担后果的决心！”此次会谈，双方辩论激烈，费时约3个小时。归邸后即乘当日最末一班火车，赶赴汤冈子温泉，迎接新年去了。

不能坐视 讲究对策

由于民国政府的外交方针愈趋强硬，日后蒙受最大影响的将是拥有利权最多的我们日本。我国在满洲有着特殊的权益和势力并处于今后可冀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的地位。然而中国国民外交运动的影响必将使我们受到阻碍。倘若坐视现在的状况任其发展下去，而不采取某种积极进取的政策。则我国在满洲的现有势力即有逐渐衰退的危险。就一般概况而论，过去20余年间，我国之于满洲，不论官方或民间都没有什么确定的方针。所幸欧洲大战以来出现了持续的繁荣，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的自然发展，使满洲的对外贸易年年增加，呈现出经济普遍兴旺的景象。二十多年来，我国居留民的增加在数量上极为迟缓，到现在南北满洲加在一起也不超过20万人，而且大部分都在满铁附属地内。除去满铁职员、关东厅吏员和家属以及附随的商人等外，我居留民的数量就没有多少，其

中再除去特殊营业者和相濡以沫的商人外，真心从事贸易或企业的人不过数千人而已，更为严重的是我居留民的积极性日渐衰退，明治年间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向满洲腹地城镇发展，经营各种企业，其后因嫌弃腹地的不便，向往于设施条件较好的附属地的生活，很多人又从已经进入的地方退回到附属地来。比如奉天这样的中心城市，附属地以外的居留民曾超过五六千人，而现在已减少到半数了。

由于商租权问题未得解决，致使我国的进步发展受到很多阻碍。居留民普遍以此归咎于政府，强烈希望政府及早确立对满方针。不论是哪一届政府，都绝不能容许从目前的现状向后倒退，因而在不久的将来，由于中国方面的积极行动而引起的日中两国之在满洲发生冲突，已成为势所难免。认清这种形势，讲究对策，做好准备，这正是当政者的责任。

军方宣传对华强硬主张

为使木村^①以满铁交涉部长的身份同奉天当局进行铁道谈判，外务省预先准备好了一套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大部分是关于铁道业务问题的，而新任的人员又缺乏有关的背景知识，为了加以研究和做好各种程序安排，需要相当的时日，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为与蒋介石会见而到南方去，至第二年1月中旬还没有回来，因此，铁道谈判也就没有开始。对于这次铁道交涉，无论在满洲或在日本内地，一般人都以为由此可以解决已经陷于僵局的所谓满蒙问题，再加上舆论机关的宣传、政府方面也因内政的需要而加以利用和鼓吹，致使人们对这次交涉都抱有极大的希望和期待。

^① 木村锐市原为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1930年，为进行同张学良的铁路交涉，特将他转任为满铁理事兼满铁交涉部长。此次交涉意在软化和降服张学良。

看到这种政治形势，感到机不可失、跃跃欲试的，是陆军系统内那些激昂气锐的陆军将校们。他们认为大前年的炸张作霖事件是彻底失败了。那时，军部似乎已有一鼓作气以武力积极解决满蒙问题的策划，然而舆论尚未成熟，政府也不赞成，煞费苦心的一番策谋终成泡影，反而产生了损伤军部信誉的后果。由此，他们认识到今后做事必须以舆论为后盾，开始研究起如何唤起舆论的策略，准备用组织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换言之，即他们觉察到在最近的思想运动中共产党的细胞组织最为有效，因而开始摹仿起来。其做法是：向陆军大学在校的青年军官们，加强灌输对华强硬的思想，以毕业后派到各地兵团的人为个体细胞，由他们与当地联队和区的司令官保持联系。同时还不懈地向在乡军人会^①和青年团灌输军事思想和对华强硬的主张，以备他日之需。在中央，则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内的佐官级的骨干分子为中心，结成了名叫“樱会”的一个团体，互相研究如何加速解决满蒙问题，并紧密地同关东军参谋们一起进行策动。

有关这等动态的情报，原是被盖上“机密”字样的。我则是同前来满洲旅行的军部之少壮将校们的会谈中有所察觉，后来又从长期担任关东军参谋、后为奉天特务机关助理的花谷（正）少佐那里直接听到的。花谷少佐是军部内一个俊才，是敢于进行策划和勇于开展工作的积极分子。他常常前来访问，坦率地交谈国事，可以推心置腹地互相交换意见。因此，我才能从他口中得知军部的这些新动向。而我则常规劝他说：不要轻举妄动，今后的对外发展，如非举国一致，是难以成功的。

同年末，满铁的谈判准备工作方始完成，已经安排就绪，一

^① 在乡军人会（1910.11.3—1945.8.31）是日本全国性统一的退伍（役）军人组成之维持军事能力的公立团体。在市、町、村、工场等基层单位普遍设立分会，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于动员参军、组织移民和镇压工农运动等方面起过重要反动作用。二战日本败降后始被解散。

俟张学良回到奉天，即可立即开始谈判了。

昭和6年（1931年）1月中旬，张学良一回到奉天，我就向他通报了赠勋的事。于同月21日在司令部布置好礼堂，文武官员盛装以待，我同各领事及张的顾问武官均着礼服准时莅临，隆重地举行了赠授勋章的仪式。接着茶果款待。礼成之后令旁人退出，我向张学良表述了下列事宜：我国政府有解决在满日中悬案的愿望，首先拟由满铁开始铁道谈判，为此木村理事已经来到奉天，为了两国的友好亲善，希望双方真诚地交换意见，以求悬案的早日解决。张学良表示同意，即于第二天22日，首次接见了木村理事。

木村理事在同张学良会见的第二天即23日，就以书面提出了我方基本上分为四点的会谈议题。一是并行线问题，其它三点是关于联运、降低借款利息以及工程费转为借款等问题。张学良即任命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兼京奉铁路局局长高纪毅为奉天方面的首席代表。木村同高会谈了两三次，东北方面当然不肯把并行线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出讨论，我方则谏为，如果不谈并行线问题就无所谓什么铁道谈判，就等于欺骗公众，使人大失所望。这是问题的焦点，双方距离颇大，意见很难一致。当此时刻，满铁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随着铁道谈判内容的逐渐公开化，有人发出议论，说什么像这类问题完全可由满铁各部通过事务程序加以解决，何须专待交涉部长去进行谈判等等，加以外间对木村理事的宣传和评价也引起某些理事的反感，而且仙石总裁对木村本人也未必真是完全信任，致使满铁内部也产生了歧异。在时间流逝之中，张学良于2月末又到他的新地盘河北去了，3月，高纪毅也追踪前往。至此，所谓的铁道谈判已逐渐漂上浅滩，竟使木村理事也向其亲人透露出请辞之意。

其时，满铁的铁道谈判迟迟不得进展，幸而由大仓男爵出

面的航空问题交涉还算顺利；岂料3月下旬我国国会闭幕时，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宣明了年度收支的赤字。这样一来，由政府筹募资金就成了难题，不得不转而指望满铁能拿出这笔资金；然而满铁亦因收入减少而甚感支绌，能否承此重担，亦无把握。这就是当时令人忧郁的实际情形。那个时期，因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内地的工、农、商各业都是一片萧条，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遂使舆论界日甚一日地起而高呼，要求在满蒙问题上寻找出路，以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满洲事变”策划人之一 ——板垣征四郎

稻叶正夫

编者按：本文摘自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出版的《板垣征四郎》一书，该书对板垣其人百般美化，竭力歌颂，观点反动。此处只摘录其中史料部分，以助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侵略的内幕及战犯板垣的罪恶活动。

板垣与“一夕会”

冈村宁次大将回想起“一夕会”时开头有如下记述：

“永田和我同是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二期生，从15岁少年时代就是亲密的朋友，尤其在少尉任官之后作为酒友成了知心。

小畑和我在中央幼年学校时同期同中队，志气相投，又同在步兵第四十九团共事，日俄战争时出征担任北朝鲜警备，关